

美国圣公会在近代湖南的活动与社会事业

张璨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 美国圣公会是安立甘宗中的重要派别, 作为来华传教的新教教会之一, 其活动范围囊括了中国大半省份。而自从 1901 年进入湖南地区后, 在教育、赈济、以及革命活动等方面对近代湖南社会都产生了影响。本文主要阐述美圣公会在湖南地区的主要活动, 以及其进行的慈善事业, 包括教育、赈济等。

关键词: 美国圣公会, 中华圣公会, 湖南, 传教;

中图分类号: K251 **文献标识码:** A

自 16 世纪欧洲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后, 新教从旧天主教中脱胎而出, 永久结束了罗马天主教会对于西欧的神权统治, 也冲击了其对于基督教教义解说的权威性。随后, 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实际需要, 简化后的新教教义在欧洲资本主义各国流传开来, 又形成了不同的教派分支。其中, 安立甘宗便是新教的重要教派之一, 在中国常被叫做圣公会。

宗教改革时期, 英国的天主教会借由 16 世纪英国新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摆脱教宗控制、削弱教会影响而脱离罗马教会, 安立甘宗被立为英国国教。十七世纪随着日不落帝国在全球的资本活动而传播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前英殖民地。安立甘宗是新教派中和天主教派差别最少的教派, 宗内没有统一的世界性的组织领导机构, 因此, 各地的安立甘宗教会也先后离开英国圣公会, 成立独立的教省。1835 年, 美国圣公会传入中国, 随后英国和加拿大教会也陆续来华, 进行传教。

一、美国圣公会近代在华活动

1835 年, 美国圣公会中国差会派遣第一批传教来华。被称为中华圣公会“创立教会之第一人”的文惠廉以新加坡和爪哇为跳板, 在当地学习汉语并向华人传教, 于 1845 年在中国开辟第一个教区——江苏教区, 1853 年在上海建造大陆第一座正式圣公会教堂救主堂, 使上海成为美国圣公会在华传教的中心, 并随着圣公会在华势力的壮大而开展了一系列与传教活动相关的教育、慈善、医疗的建设。1879 年, 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 (Schereschewsky) 将圣公会创办的培雅书院 (1865 年) 和度恩书院 (1866 年) 合并, 成立圣约翰大学。“它位于全国最大的商贸城市的郊区, 有博学的施约瑟建办一些学校作为基础, 在其伟大的校长卜舫济 (F. L. Hawks Pott) 的领导下, 成为当时最有效的教会大学。它的学生大都来自富有家庭——一九一三年有三百七十名。”^①随后, 在 1930 年, 美国圣公会在武昌主办了以文惠廉主教命名的正规大学——文华大学。该大学于 1909 年成为综合性大

^①引自赖德烈 (Kenneth S. Latourette) 著, 雷立柏、静也、瞿旭彤。成静译《基督教在华传教史 (A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页 531。原文见《新教在华传教一百年 (1807 年-1907 年)》, 页 386, 《中国教会年鉴》(1911), 页 151

学并于 1911 年授予了第一批学生文科学位（the first Bachelors of Arts degrees），并设置了配套的图书管理员训练学院。^①

在医疗传教方面，美国圣公会于 1866 年在上海创立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并在圣约翰大学成立后成为其附属医学院。1901 年，圣公会第一次江苏教务会议（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Conference of Kiangsu）决定，在新闻圣彼得堂旁购置土地建造妇幼医院。这项计划到 1903 年 2 月 17 日得以完成，并被命名为广仁医院（St. Elizabeth's Hospital），作为圣公会妇女工作中妇女医疗的重心。除此之外，美圣公会还在安庆设有教会医院（St. James' Hospital），在无锡设置了普仁医院（St. Andrew's Hospital）^②等。据统计，截止至 1920 年底，美圣公会在华共设置差会总堂 16 座，各地分堂 91 座，外国职员 210 人，中国职员共 1076 人^③。

而为了更进一步进行在华传教的合作。1897 年，英行教会、英国圣公会。美国新教圣公会（American Protestant Episcopalians）和加拿大圣公会（Canadian Anglicans）等的大部分在华主教和一些教牧人员在上海聚会，并于 1899 年、1903 年和 1909 年举行类似集会，商议圣公会在华联合合作的可能性。而在 1909 年的会议上，各方代表终于通过了一个统一的教会章程，并得到英美各圣公会的批准。1912 年，各在华圣公会于上海召开第一次全体教牧会议（the first General Synod），联合成立中华圣公会（Holy Catholic Church of China），囊括了十一个教区及三万受洗成员，将圣公会在华传教工作置于统一领导之下，组成了一个合作更为密切的传教联合体^④。

二、美国圣公会在近代湖南地区的活动

美国圣公会在 1900 年前就注意到了三峡以东的长江流域，并先期在汉口建立了自己在该地区的传教中心。他们在长江沿岸一些重要的城市，如南京、江苏、无锡、扬州及就将和南昌相继建立了传教站，而为了鄂湘教区的发展，势必要使圣公会势力进入湖南。

湖南素有“铁门”之称，当地的排外情绪比中国任何地方都要强烈，传教士们很难进入

^① 引自《传教的精神》，卷七十二，页 9；卷七十四，页 851；卷七十五，页 673。

^② 引自林美玫《追寻差传足迹—美国圣公会在华差传探析（1835 年-1920 年）》，页 238。由于当时圣公会在华医疗人力的不足，一些医疗传教士在少数传教站设有诊所。1918 年，圣公会为了整合医疗事业上有限的人力和物力，郭斐蔚主教（Frederick Rogers Graves, 1858-1940）先提出上海教区医院增修扩建企划案，后又提出同仁医院与广仁医院的合并案，两者均未为母会差传总部所同意。

^③ 数据来源为中华续行委员会编，《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原《中华归主》修订版）》下卷，附录八，页 1514。

^④ 引自赖德烈（Kenneth S. Latourette）著，雷立柏、静也、瞿旭彤、成静译《基督教在华传教史（A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页 561。原文见 Bishop C. P. Scott《东方与西方》，卷十六，页 303；Stock 著《圣公会的历史》，卷四，页 294—295；《传教的精神》，卷七十二，页 556、卷七十七，页 503；Louis Byrde《东方与西方》，卷十一，页 66—81；《教会传教报》（July.1909）；Gascoyne-Cecil《变化中的华夏》，页 216；《中国教会年鉴》（1912），页 203；《教务杂志》，卷四十三，页 378；《爱丁堡会议报告》，卷二，页 290。

这里或者长久停留。由于 1858 年《天津条约》的签订，中国长江流域被迫开放，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华内地传教的自由，上海伦敦会的传教士随即试图进入湖南地区。传教士杨格非于 1880 年、1883 年和 1893 年三次进入湖南省境内，并于 1891 年和 1892 年带领一些伦敦会的华人教民在长沙发放过一些基督教书籍，但是由于当地人民反对情绪强烈而无法进行后续工作^①。1901 年，美圣公会中国差会进入湖南地区，差会派遣傅悦斋等去湖南境内考察，并于 1902 年派黄吉亭来长沙筹设教堂，最初即在吉祥巷租借得一处民房，开始传教。

黄吉亭（1868—1954），美国圣公会鄂湘教区中国籍牧师，早年就读于武昌文华书院，毕业后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院学习，1891 年被授予神职，是美国圣公会鄂湘教区最早的一批中国神职人员。1901 年，黄吉亭在武昌府街圣救世主堂创办了书报阅览室——日知会，以书刊和宣传册的形式进行传道，并从上海等地购买《开智录》、《国民报》、《万法精理》等进步书报，利用教会的特权公开陈列，吸引进步知识分子和革命人士进入日知会，为圣公会的传教活动做出了巨大贡献^②。在 1902 年被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汉口教区首任主教殷德生派往长沙后，黄吉亭利用武昌的经验，将日知会的工作带到长沙，在新建的三一教堂设立日知会阅报室，购书报开通民智，“从此学界军界皆入于圣公会之门，而长沙日知会乃极一时之盛”^③。美国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吴德施认为：“依吾之见，较吾在华各地之感受，长沙之气氛更似日本。爱国主义和进步精神高涨，青年出任要职，非同往常之论资排辈”。他甚至把长沙的工作称为整个鄂湘教区“最为浪漫的事工”。而黄吉亭在吉祥巷所主办的三一教堂后来也成为了美圣公会三一小学的前身。

由于吉祥巷教堂条件简陋，卫生条件极差，不利用吸引人们慕道。1905 年，孟良佐到达长沙，在北正街选址，建立了一座新的圣公会教堂。这所教堂在 1910 年的长沙抢米风潮中被毁，1911 年开始重建，直至 1915 年才完全修建好，成为美圣公会在长沙地区传教的中心。1904 年，黄兴、陈天华和刘揆一等人长沙创立“华兴会”，并在长沙圣公会日知会进行秘密联络和聚会。1904 年 11 月，黄兴计划乘慈禧太后庆贺大寿，湖南全省大吏参加庆典之际，在会场引爆预埋炸药，以引起混乱，并乘机在湖南起事。但起义消息遭人泄露，并引来当局对华兴会侦缉和搜捕。牧师黄吉亭当即将黄兴藏匿于圣公会楼上，并在一月后将其安全送出长沙城。辛亥革命胜利后，黄兴受邀至新建成的圣公会教堂演讲，对圣公会的帮助给予了感谢：“几遭不测，幸有圣公会得保残喘……兄弟蛰居楼上者十余日，遂得从容遣解党羽，子身远扬。皆吉亭先生格外保护，化险为夷……迨事稍定，吉亭先生又护送至汉皋，保护周

^①引自赖德烈（Kenneth S. Latourette）著，雷立柏、静也、瞿旭彤、成静译《基督教在华传教史（A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原文见 Jhon《来自华夏的声音》，页 220；Thompson《杨格非·在华五十年》，页 482。

^②王威，《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牧师：黄吉亭与胡兰亭》，宗教周刊·人文史地，2011 年 11 月 10 日，07 版

^③曹亚伯著，《曹亚伯自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页 37—49。

至，较之保护信徒尤加一等。盖欲吾侪一心改造国家，使一般人民皆享自由幸福也”^①，并为教堂题词“上帝圣名，敬拜宜诚，辞尊居卑，为救世人”，该题词至今仍保存在长沙北正街教堂大门内侧。

教育事业向来是传教士进行传教的重要方式之一，每个教会在开拓自己的传教区域时，也总会设立各级学校来确立和巩固在该地区的传教成果。圣公会在湖南地区的传教相对而言也最为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1903年，黄吉亭在吉祥巷租堂传教时，同时建立了一所小学；1905年教堂迁到北正街，并在潮宗街办了一所小学。1908年在北正街教堂后，英圣公会兴办了雅各中学。1924年在北正街新建造一座四层灰砖教学大楼，办了三一女校。1929年雅各中学停办^②，圣公会几所小学合并于北正街，男女兼收，即长沙市私立三一小学。据曾在三一小学上学并任教的李遇恩回忆，“……每天朝会时，校长高声为学生祷告，祷告毕，学生齐应‘阿们’，有时还教学生唱赞美诗。星期日教堂为儿童办“主日学”，精美的画片曾吸引许多儿童参加。星期四下午唱诗班练习，虽只部分教会子弟参加，也常引起不少小学生停步。特别是圣诞节前夕的节目表演和复活节寻蛋等活动更是吸引了众多的非教徒家庭的子女。中高年级还有堂圣经课，由会长或教士亲自讲圣经故事，更是在直接地传教了”。而三一小学所使用教材也是圣公会鄂湘教区统一发放的，期末考试由教区制卷，同时举行，专人监考，当场开卷，统一评分标准。教学科目除按国民党政府所规定的以外，中高年级还有堂圣经课，四年级(后改为五年级)以上每周两节英语^③。

三一小学对音乐尤其重视。在胡依菊担任校长期间，全校每期有一两次歌舞晚会，校长还曾指导合唱团演唱《目莲救母》。1936年以后，抗日救亡歌曲成了音乐课的主要教材。

《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都曾激励着孩子们。1937年，三一小学的师生还曾走上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解放后，改名为光明小学，后统一由街道命名，更名为北正街小学，于20世纪90年代停办。

三、美国圣公会在湖南的慈善救济活动^④

^① 同上。1903年黄兴于返国停留上海期间，曾参加上海圣公会圣彼得堂的聚会，并未受洗。该堂会长吴国光牧师至信黄吉亭，请他接待黄兴，并建议将其名列入教会登记名册中；1913年，黄兴在上海圣彼得教堂接受洗礼，成为圣公会教徒。

^② 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袭来，教会学校开始被迫紧缩，直到1932年才逐渐复苏。在此期间，各教派为节约资金，压缩一些社会事业如大学、中学、小学以及医院和诊所。各教会学校多合并或停办。从1924年到1929年，华中大学和雅礼私立中学相继合并成立，然而雅各中学并没有参与这次的合并，再加上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和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私立学校管理规程》中对教会学校的限制，遂于1929年停办。

1929年，美国圣公会撤销了雅各中学，转而将其在长沙的其他几所小学合并成了长沙市私立三一小学，把更多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湖北。

^③ 李遇恩，《关于长沙市三一小学的点滴回忆》，原载《长沙市北区文史资料》第2辑，1986年12月。本文作者系三一小学毕业学生，后又在该校任教员。

^④ 由于美圣公会进入湖南地区后不久即与其他圣公会联合成立中华圣公会，因此下文均以长沙地区圣公会为主体。

中日甲午战后，湖南风气大开，传教的障碍逐渐减少。而各个教会也借此时机开始在湖南布道，一时间，教会传道的压力开始变大。为了给基督教在湖南传播铺平道路，以赢得中国民众对于教会的好感和敬意，为基督教铺平道路，圣公会和其他各教会一样，开始在长沙等地兴办慈善事业。至此，圣公会慈善事业开始在湖南地区兴起。

湖南历来为多灾之地，尤其处于湘江和洞庭湖流域。水灾、旱灾、虫灾等都会给当地带来严重影响，尤其是水灾，对于长沙地区的危害最大。每当灾害发生时，圣公会中外教徒都会倾力赈灾，在道路上布棚施粥，引导灾民前往救济点，筹集善款等等。例如1906年湘江发生近百年来罕见大水，长沙圣公会慷慨捐助洋二十二元、钱十千零三百六十二文；1909年湖南发生水灾、虫灾，粮食歉收，长沙各教会基督信徒公举圣公会黄瑞祥演说各地灾情，并劝诸人助捐赈款，听众当即慷慨解囊。随后北正街教堂又捐洋二十八元，用以赈灾，并经长沙基督信徒协赈处举圣公会黄瑞祥牧师充当经理，总司放赈事务；1924年春夏，长沙地区突遭水灾，在长沙的各个教会立即行动，筹款救灾，同时联合组成救灾团，由信义会的梁家驷和圣公会的张海松主任，专门负责分途办理灾民救灾事宜，并致函中国华洋义赈会湖南分会，请求拨发紧急款用来赈灾^①。

湖南红十字会是在辛亥革命中草创并发展起来的。在湘军援鄂作战中，由于没有健全的军医设备，在战场上烧伤的士兵往往无法及时得到有效的治疗，省会中西慈善家经过商议，计划组成了红十字会，创设之初规定会员30人，其中华人20人，外国会员10人，副会长即为圣公会牧师孟良佐。这种中西合作共办慈善在湖南尚属首次，并设立了临时医院，对救助伤兵，以及对伤员的心理疏导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红会临时医院为辛亥革命事起，南北议和后，战事减少，本应该就此取消，但由于来求诊的患者日益增多，便依照各国红十字会的先例，至1912年5月止，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永久医院^②。由于湖南地区自“二次革命”以来战乱频发，对于兵灾圣公会教士也积极组织教徒参加赈济工作，救护伤兵病民以及救助难民出险。至此，由圣公会参与进行的红十字会救助工作除了对当时兵灾赈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外，也对长沙医疗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华民国成立后，教会在华的传教和慈善活动得到政府的许可，与中国社会的融合日益加深。湖南社会也改变了以往对教会的排斥态度，取之以认可乃至敬仰。一些社会上层士绅对于教会影响都大为改观，在地方的慈善事业上也开始愿意和教会合作。1912年黄兴为长沙中华圣公会题词：“耶稣圣名，敬拜宜诚，俾尊居卑，为救世人。”^③。因此，有了政策的允许和以及社会的接纳，教会也就摆脱了为传教而做慈善的境况，其慈善事业的发展进入了最好的时期。据《民国日报》1923年5月8日报纸记载，包括圣公会公职人员在内的长沙基督教会发起“非战运动”，反对北方军阀之武力统一；以及湖南《大公报》记载：“张

^①向常水著：《基督教在近代湖南的发展及慈善文教事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1年。

^②陈先枢编：《湖南慈善档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页150。

^③陈先枢编：《湖南慈善档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页278。

敬尧之兵自长沙败后，即行退守岳州。该军无毫无人道，将全城商铺概行掠空，虽贫苦之家亦必受其害，数千难民均逃入岳州城内美国圣公会避祸”^①等，都是圣公会对于为赈济兵灾和反对战争所做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沙圣公会的处境更为艰难。日军进攻湖南地区，教会建筑物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恶破坏，原有的慈善事业也难以维系。再加上战时经济苦难，通货膨胀日益严重，随着战事发展，教会人员也在不断迁移。但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圣公会等教会仍能克服重重苦难，尽力维持慈善活动。在战火还未蔓延至长沙地区时，长沙圣公会设法将会中所有房屋以及校舍利用起来，开办难民宿舍和难民浴室。时任长沙圣公会会长的刘尧昌兼管难民收容所等救济工作，及缝军衣、军鞋等支前工作；抗战胜利后，又与联合国救济总署有联系，替颠沛流离的穷困人民做了不少贡献。据长沙《力报》1938年1月25日载，“中华圣公会丁会长夫人鉴于一般难民终日无所事事，殊属可悯，拟开办一工厂，容纳若辈，以从事生产事业，特请南京妇女工厂厂长郭养元君代为设计指导。”^②为收容战争难民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武汉失陷，长沙告急之时，该会教士和教徒又积极带领难民撤退至安全地带；“文夕大火”后，长沙城近三分之二都被付之一炬，圣公会又协助国家救济协会在长沙市设立粥厂，施粥救济，并“……特创办难童小学四校，以收容各战区逃湘及本市被灾之失学儿童。计已开办者有北门外雅礼学校及北正街圣公会两校，收容学子达五六百人之多。”^③据湖南《大公报》1946年2月24日报纸记载，由湖南省国际协会发起，以圣公会等八家教会为介绍处，为本市贫苦灾民提供小本贷款，贷额每户自一万至五万元止，月息一分，期间以三个月为限，分两次归还，以帮助他们在战后重新安定下来生活。在抗战胜利后，湖南各地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无数难民等待遣返回籍。而恰逢此时全省大部分地区又遭旱灾，因此加大了灾民的救济难度。此时教会在安排灾民复员的同时也安排赈灾措施。圣公会和中华基督教会、内地会等一些教会在市区分别设立施粥站，救助城乡灾民及过境难民。然后组成国际救济协会协助政府赈灾机构发放救济物资和冬赈寒衣，在一定程度上对减轻政府的救灾压力有积极作用。圣公会以上所作所为真正践行了基督救世之精神，对中国人民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支持和贡献。

圣公会教会在长沙做慈善事业，最初是为了传播福音，但它的宗教功效并不明显。相反，它的世俗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特别是到了民国以后。从1912年到1937年这一段时间内教会在医疗卫生和慈善赈济方面出力良多，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这些举动对于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保障都是有益处的。

四、美国圣公会在湖南地区慈善活动的特点

^① 湖南《大公报》1920年7月11日。

^② 长沙《力报》1938年1月25日。

^③ 邵阳《力报》1938年1月25日。

一般而言，基督教会在华慈善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其传教活动服务，大体上分为教育、医疗、救济三部分。

教育事业是圣公会在湖南重点建设传教事业之一。借助于教会学校的设立，潜移默化地对求学学生进行信仰的引导，而 1901 年—1920 年，湖南全省的学生与信徒之比例，以福音会、英圣公会、复初会、美圣公会所报告的比例数为最高^①。据统计，美圣公会在湖南地区共设置初级小学 7 座，高级小学 2 座，未设置中学校；中学以下教会学校学生总数为 213，教会小学男学生比例为 71%，初级小学生升学率为 32%，未设置高等教育及师范教育，而圣公宗在湖南唯一一所中学校及雅各中学为英圣公会设立^②。由此可见，美圣公会在教会学校方面主要集中于小学初级教育，如三一小学便是其中最成功的例子。

除了建立教堂、分发资料、维持学校外，医疗传教也是新教传教活动的一个特色。在传教士们看来，华人拥有大量的医学文献、许多制药方法以及众多大夫，但对于解剖学方面知之甚少，对病的救治方法也往往是“庸医式”、“迷信式”的。由于十九世纪后半叶时，西医中麻醉剂和消毒剂方面进步很大，并在疾病的减缓、治疗和防治方面能够给中华内地带来巨大的贡献，因此，许多医务人员在传教差会的支持下来华，在减轻人们痛苦的同时，消除华人对于基督教信仰的一些偏见，促进教会传教事业的发展^③。因此，一般来说，教会医疗事业中的宗教目的被认为和医疗目的同样重要^④。但由于人手不足和医疗事业的特殊性，圣公会在湖南地区的医疗事业近乎于零。据统计，在 1901 年—1920 年间，整个湖南省并没有圣宗设立的医院或护士学校，仅英圣公会拥有一座药房^⑤。

而关于赈济救灾事业，圣公会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对兵灾和难民的救济上。由于教会的慈善活动往往依附于其传教活动，而湖南地区也不是圣公会宣教的重点地区，因此，在湖南地区的赈济活动力度并不大，大多数时候是联合其他教会一起展开。在中华民国成立后，教会在华的传教和慈善活动得到政府的许可，圣公会和其他教会联合成立了多个慈善组织，并在抗日战争中为难民和中国军队提供了许多必要的帮助。美公理会来华传教士明恩溥就曾表示：“赈济给传教事业带来了转机……许多反对外国的偏见消失了，或是被压下去了。”^⑥由

^① 中华续行委员会编，《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原〈中华归主〉修订版）》上卷，页 282。

^② 数据来源为中华续行委员会编，《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原〈中华归主〉修订版）》上卷，页 283，湖南省基督教事业范围中之教会学校表。

^③ 引自赖德烈（Kenneth S. Latourette）著，雷立柏、静也、瞿旭彤。成静译《基督教在华传教史（A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页 385。

^④ 见《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上海一八七七年五月十一—二十四日》，页 114—132。一八七七年大会上，一篇文章代表了当时人们比较典型的观点，医疗传教士的目的有三：第一，他们应该比中医更好地帮助人们减轻痛苦；第二，能消除人们对基督教信仰的偏见；第三，能引导病人归向基督信仰。

^⑤ 数据来源为中华续行委员会编，《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原〈中华归主〉修订版）》上卷，页 286，湖南省基督教事业范围中之教会医务表。

^⑥ Harold.S.Mathews: *Seventy Five Years of the North China Mission.1935*, 页 26—29.转引自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年，页 311。

于赈济救灾事业是最能广泛为群众接受，并且提高教会名声的方式，且受政府制约较小，因此十分受到教会自身关注。

由于湖南开放较晚，当地民风又比较排外，因此各个外来差会很少会以湖南作为主要宣教地。而美圣公会在华的主要宣教地主要在上海、湖北、江苏、福建等地，1900年以后才在江苏、江西开辟了新总堂并将其宣教事业由湖北扩大到湖南北部，并在十年内都无建立新总堂的报告^①。而整个圣公宗（包括英圣公宗各差会）的信徒也大多集中在闽、蜀、苏、浙诸省，而至1920年，在华十九省的受餐信徒总数则为19,114人，湖南地区仅有319人。同时，美圣公会也是未在湖南地区划定宣教地的差会之一，其宣教事业仅限于长沙、常德二城^②。因此，美圣公会在湘所投入的人手和宣教规模都是十分有限的。

但是，在这样有限的情况下，教会为湖南地区带来的变化却是全方位的。早在美圣公会牧师黄吉亭入湘之初，就通过日知会支持革命党人的活动，并先后为黄兴和宋教仁提供帮助，使两人逃过当局的追捕。在建立教堂之后，圣公会所经办的社会事业也推动了湖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在这种大背景下，教会学校、医疗、甚至是救灾赈济中的宗教功能变得并不显著，对当时人们产生巨大影响的恰恰是这种传教事业上所附带的社会功能。人们可以通过教会兴办的学校学习近代知识，也可以通过教会医院享受更加可靠的医疗服务，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陋习也所有冲击，推动湖南地区走上更加开放、更加近代化的道路。这些不仅仅是基督教救世济人的宗教观念的体现，也是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彼此融合，构筑了近代湖南地区多元化的历史格局，并推动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1901—1920 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原〈中华归主〉修订版）》〔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版。
- [2] 梁湘山编，《湖南省志·宗教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 [3] 长沙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长沙市宗教事务局主编，《长沙文史-宗教史料专辑》，2001 版
- [4] 石建国，《卜舛济传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版。
- [5] 张湘涛编，陈先枢、梁小进撰，《老照片中的长沙》，岳麓书社，2014 年版。
- [6] 陈先枢撰，《湖南慈善档案》，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
- [7] 林美孜著，《追寻差传足迹-美国圣公会在华差传探析（1835-192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版。

^①数据来源为中华续行委员会编，《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原〈中华归主〉修订版）》上卷，页 787。

^②数据来源为中华续行委员会编，《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原〈中华归主〉修订版）》上卷，页 266。

- [8]周秋光、张少利、许德雅等著,《湖南慈善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 [9]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版。
- [10]赖德烈著,雷立柏、静也、瞿旭彤、成静译,《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电子版
- [11]曹亚伯著,《革命真史:辛亥风云现场实录》,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版。
- [12]黄兴著,《黄兴自述》,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1版。
- [13]韦国友著,《关于辛亥革命中的爱国教徒》,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
- [14]向常水著,《基督教在近代湖南的发展及慈善文教事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1年。
- [15]高明著,《近代湖南教会学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3年。
- [16]王威著,《武汉基督徒与辛亥革命研究——以武汉圣公会为讨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4年。
- [17]王威著,《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牧师——黄吉亭和胡兰亭》,武汉文史资料,2005年。
- [18]康志杰著,《中国基督徒参加辛亥革命的文化解读》,《天风》,2011年第12期。

The activities and social undertakings of the episcopal church in modern Hunan

Zhang Can

(Hunan university, Hunan Changsha, 410000)

Abstract: The episcopal church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nglican sect. Since entering hunan in 1901, it has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modern hunan society in education, relief and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This paper mainly describes the main activities of the episcopal church in hunan province and its philanthropic activities, including education and relief.

Keywords: American episcopal church, Chinese episcopal church, hunan, mission;

作者简介(可选):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史专业研究生,中国近现代史方向。

